



清史译丛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九辑（罗威廉专辑）



浙江古籍出版社



清史译丛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九辑（罗威廉专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史译丛. 第 9 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0715-493-8

I. 清… II. 国…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清代
IV. K249.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925 号

清 史 译 丛

第九辑(罗威廉专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郎震邦 屈笃仕

封面设计  杨龄

照 排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493-8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清史译丛》编委会

主 编：于 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素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张西平 [英] 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执行编辑：徐思彦 王大庆 戴 寅 叶柏川

康 越 唐 博



序 言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搞好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既要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是完成新世纪我国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切实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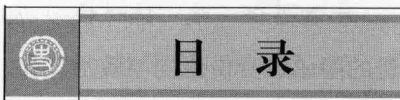
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研究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时，应高度重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背景。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如何认识和体现出“世界眼光”，即是重要的理论准备之一，为此，我们需要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做到光大中华文化，而且能促进全球文明。

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论点摘编”、“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清史译丛》是广大清史研究者、爱好者共同的园地，让我们共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她，使其在清史纂修工程中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1月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18 世纪以后的历史（中文版序） 马 钊 杨念群著 / 1
导言：走近 19 世纪 [美] 孔飞力著
牛贯杰译 王 笛译校 / 10
中日关系的决定性转折：1862 年“千岁丸”的上海之旅
[美] 傅佛果著
牛贯杰 郭 晶译 冯慧轩译校 / 16
19 世纪广东的牛痘接种业 梁其姿著
董建中译 任 可译校 / 35
清中期绅士家庭的嫁妆与妇德 [美] 曼素恩著
毛立平译 彭涓涓译校 / 67

惊世危机与诱人机会：19世纪晚期中国政治及文化变迁

[美] 冉玫铄著

牛贯杰译 张 婷译校 / 79

神秘的语言和沟通：19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

王 笛著译 / 103

帝国统治危机时期清代君主的朝政观

——以19世纪考绩为例

[法] 魏丕信著

阙红柳译 张 婷译校 / 124

“营运生息”：清代军队经商考

[美] 戴莹琮著译 / 157

虞翻祠：19世纪广州精英群体和地方认同

[美] 麦哲维著 赵 刚译 / 210

书写秋瑾生平：吴芝瑛和她的家学

[美] 胡 纛著

毛立平译 任 可译校 / 238

《红楼梦影》及其出版商北京聚珍堂

[美] 魏爱莲著

毛立平译 贾 宁译校 / 279

危机中的《申报》：国际背景下的郭嵩焘与《申报》之争

[德] 鲁道夫·瓦格纳著

毛立坤译 马 钊译校 / 296

何处是文化业的中心：从地方艺人到全国明星的晋升看清末北京
与上海文化经营模式间的竞争

[美] 叶凯蒂著 郭 晶译 马 钊译校 / 334

编后记

牛贯杰 朴世英著 / 370

18 世纪以后的历史（中文版序）

□马 钊 杨念群 著

诚如孔飞力教授在开篇所说，这一期专号“不是作别，而是庆贺”，庆贺罗威廉教授在个人学术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就，庆贺他为推动清史研究所作的贡献，也庆贺他主编的《晚期中华帝国》杂志即将步入创刊后的第 43 个年头。

辉煌的 18 世纪

回首《晚期中华帝国》（及其前身《清史问题》）已经走过的 42 年历程，它的成长勾勒出了海外清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在 1965 年创刊之初，《清史问题》只是一份美国清史学会的内部研究通讯，登载的文章大多是会议信息、会员通讯录、清史资料介绍、专题研究简报和体裁不一的各种随笔性短文。这反映出 20 世纪 60 年代海外清史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无论是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深度都无法与日后相比。不过，现在回头再看《清史问题》的创刊历程，值得肯定的是其中登载的大量学术活动信息有助于将学者的个人经验汇集成集体智慧，为清史研究深入发展奠定基础，而且这一时期文章的撰稿人日后大多成为海外清史研究的名家，比如谢诺（Jean Chesneaux）、孔宝荣（Paul Cohen）、狄百瑞（W. Theodore de Bary）、房兆楹、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何炳棣、市古宙三、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刘广京、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等。

经历了草创阶段，20世纪70年代《清史问题》收录的研究性文章逐渐增多，这表明《清史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供会员交流信息的研究通讯，它逐渐发展成为专业学术期刊。这一时期《清史问题》出版的学术论文大多反映了当时清史乃至中国历史研究的旨趣，亦即关注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着眼近代中国改革的成败。论文议题主要集中在帝国主义入侵和渗透、洋务运动、铁路、外交、教案等方面。这些文章基本遵循了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划定的清史研究取向：(1) 突出制度史研究，清代各种政治、经济、外交制度决定了清朝内部组织运转模式，也影响了它对西方外来事物的反应方式。(2) 突出西方因素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费正清体系的基本理论假设认为中国是停滞的社会，中国内部缺乏变革的动力，只有西方才能为中国带来真正变化，因此要了解中国近代发生的巨大转变，必须关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交流和冲突。(3) 清朝的历史是一个失败的样本，它落后于世界发展趋势，也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因此研究清史，就是要挖掘导致清朝失败的各种因素。

进入20世纪80年代，李中清(James Z. Lee)、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等相继担任主编，《清史问题》也更名为《晚期中华帝国》，收录的论文除了继续增强研究性之外，涉及的领域也日趋多样化。既保留了史料信息和研究综述等介绍性文章，也包括了新兴的人口史、妇女史和社会史的论文。20世纪90年代罗威廉接手主编一职，挑战传统观点的趋势更加明显，《晚期中华帝国》刊登的学术文章呈现以下特点：

突出地方史研究。在施坚雅区域研究的指引下，中国不再被视为是一个单一(monolithic)、同质(homogeneous)的政治经济共同体。相反，受文化传统、自然地理障碍和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影响，中国可以被划分成若干面积广大、彼此相对独立的区域。各地区内部有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也有落后的边远地区，但是由于频繁的经济活动与文化交流，区域内部的依存关系要远远超过区域之间的联系。区域研究没有遵循传统的行政区划，突出自

然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对地方经济文化生活的影 响。由此产生的地方历史研究，强调地方政策、地方冲突、地方/中央整合，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场景。

多元的清代社会还体现在族群构成上。清朝的重要政治遗产就是建构了一个多民族帝国（multi-ethnic empire），满、汉、藏、回等生活在统一而灵活的政治经济框架之下。具体到政治制度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采纳了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以应对不同的族群，比如用八旗制度管理满洲人口，依靠盟旗等维系与蒙古诸部的关系，沿用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原地区强化官僚政治体系等。这种“一国多制”的政治理念不仅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还体现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强调清帝国的民族多元化特征，最终挑战了传统的“汉化模式”。

清朝的多元化特点不仅体现在地域和族群差异上，还存在于阶级、阶层的分野。传统的研究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看待历史，强调研究统治上层制定的各种行政措施、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但是新的研究强调统治者心中的理想政治社会形态与下层生活实际之间的差距，质疑上层意志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为下层日常生活实践。换言之，新的研究不仅研究考察统治规范的建构过程，更要努力发掘下层生活状态，最终考察二者之间的差异和互动。由此出发，《晚期中华帝国》刊载了大量研究下层社会、边缘人群和异端思想的文章，这些人群和思想虽不见容于统治阶层制定的行为规范，但确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社会有自身的发展轨迹，这是“中国中心观”的基本理论预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史全然脱离于世界历史之外。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诸多共同问题，例如人口增长、政权巩固、疆域扩张、行政改革、社会变迁等。不同的解决方法导致了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轨迹，但是共同的问题奠定了历史研究的对话基础。《晚期中华帝国》的许多文章从两方面体现了清史与世界历史的复杂关系和紧密交流。首先，比较研究的框架彰显了清代社会经济成就，特别是对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研究，有力地批驳了传统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其次，借鉴其他国

家历史的研究，可以引入新的研究旨趣，比如对明清时代中国印刷文化的研究就深受欧洲印刷史的启发。这些研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古籍研究、版本学和思想史的范畴，更加注重印刷出版背后的商业史、大众文化等。

总而言之，经过罗威廉等数位主编的共同努力，《晚期中华帝国》刊载的大量关于18世纪中国的文章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不同的清朝。这个清朝迥异于费正清笔下那个年迈老朽、故步自封的老大帝国，相反，这是一个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中国。文章中描述的人口增长、市场发展、疆域扩张、务实的政策、行之有效的管理、机构改革和增长的海外贸易等，共同展现了一个辉煌的18世纪。

在分析18世纪中国取得的种种成功的背后，是对原有的“西方中心话语”、“汉化模式”和“上层话语”的摒弃。首先，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和力度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其次，中国内部的地区差异和发展方式也不能用以汉族为中心、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模式来理解；第三，中国社会内在的张力和活力也不能仅从上层精英的理想建构来认识。这些就是《晚期中华帝国》为清史研究提供的新的视角。

重新考察19世纪

新世纪的到来给清史学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经历了大约十年之久的18世纪研究热潮之后，清史研究应该向何处去？风云激荡、中西冲撞的19世纪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研究19世纪？如何将18世纪研究中取得的有益经验用来研究盛清以后的历史？出于这样的思考，《晚期中华帝国》决定编辑一期专号，主题选定为19世纪的中国，收录的5篇文章涵盖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医疗实践、妇女家庭、秘密社会、中日关系等重要问题。孔飞力教授已经在卷首前言中对各文章主要观点作了介绍，此处不再赘言。

就在这期专号组稿之际，经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商议，双方同意由《清史译丛》负责以特刊形式翻译本期专号。考

虑到《清史译丛》对篇幅的要求，中文特刊还增补收录了《晚期中华帝国》以前发表的5篇论文，分别涉及19世纪中国的财政体系、地方认同、女性文化、新闻出版和娱乐文化等方面。

戴莹琮的文章跨越18、19两个世纪，探讨了清朝一项旨在解决军费问题的重要财政措施“营运生息”的兴起和终结。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以八旗、绿营为主体的清代军事体系数量庞大，是清朝对内统治和对外征伐的军事基础。清中期，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国内局势基本稳定，对外用兵也取得巨大成功。不过在胜利的光环背后，是沉重的军费负担。这不仅仅是国家层面上的财政问题，也是关乎士兵身家性命的生计问题，这是“营运生息”措施出台的背景。该措施的基本特点是由政府提供资本，军队参与市场投资，用商业利润补给军饷，以减轻政府的军费压力。研究“营运生息”措施的制定，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18世纪清朝财政制度改革的了解，再度阐明清朝是如何运用务实的政策完善统治结构的。军费市场化也展现了清中期以来出现的社会经济深刻变革，“营运生息”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市场、多样的资本信贷和商业化的社会，这些都是充满活力的18世纪中国经济的例证。随着18世纪的结束，“营运生息”亦被废止，军费改由国家财政全数供给。“营运生息”政策引发的讨论涉及了财政领域内中央控制和地方自主之间的矛盾，商业活动和军队国防职能的冲突，以及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辩”。最终废止这项措施蕴含了复杂和深远的意义，从表面上看，军队退出市场、国家划拨军费是国家财政坚实实力的证明。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庞大的军费负担直接导致了财政危机，而日渐衰弱的财政供给又是造成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麦哲维的文章围绕广州的地方名胜虞翻祠研究了地方文化的构建过程。在清代，各地修建祠堂纪念先贤大儒的活动屡见不鲜，与之相伴的是围绕地方名胜展开的文人聚会、唱和、结集出版等活动。凡此种种都成为地方精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众多研究江南地区文化和精英活动的文章中多次见到。由此看来，似乎发生在虞翻祠的一切事情都不过是江南士大夫文化的翻版。

其实不然，本文展现的是江南中心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换言之，这里强调的是江南文化的统治地位（hegemony）和地方的多元化认同（local identity）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关系。麦哲维的文章指出，精英文化活动在形式上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整合，以江南为代表的精英社交方式、精英身份建构不断地被其他地区所效仿，可是结果并不是江南文化统领全国，恰恰相反，是地方文化的兴起和地方认同的构建。麦哲维强调，虞翻祠展现了一种地方文人在中心压力下的地方焦虑，广州地处岭南，远离帝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和文化中心（江南），这种边缘特性促使广州的文人们不断寻找自己在全国文化版图上的位置，是成为附庸，抑或自成一派，其间的取舍造就了虞翻祠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这也成为 19 世纪广州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异军突起的滥觞。

胡纓的文章关注清末女界闻人吴芝瑛为其挚友秋瑾五度撰写悼文的一段往事，研究了文学创作、历史记忆、女性传统和政治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晚清历史，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二元对立的话语理解政治文化变迁，例如保皇/革命、保守/激进、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等。可是胡纓笔下的吴芝瑛却偏偏要穿行于这些本来泾渭分明的框架和类属，她家学桐城学派，却和革命女性结成莫逆；她给为共和殉难的秋瑾立传，却采用古史传记体例；她知道秋瑾那些颠覆传统的事迹，却在悼文中将其纳入传统侠女的范畴；她的写作没有迎合当时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冲击，而是在中国古代典籍《史记》、《周易》中得到灵感。有别于五四以来历史写作中的线性化发展和黑白对立的模式，吴芝瑛展现了复杂和模糊，可能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与此同时，胡纓的文章也告诉了我们处在变革时代的历史人物怎样调和各种矛盾事物，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新旧割裂”，而是“操纵一些可用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以达到“与传统经典的创造性结合”。

魏爱莲的文章研究了 19 世纪末北京的一家出版商聚珍堂的历史。无论是在出版史，还是商业史中，这家出版商的名字或许并不耀眼，但是它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了解新旧时代交替和雅俗文

化互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出版业经历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转型，日常经营过程中，这些转变主要体现在图书遴选、市场开拓、读者群体确定和广告的发展等方面。有些研究将出版业的商业化、市场化、大众化的转变追溯到唐宋转型时期，更多的研究将明清之际视为出版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到了19世纪，随着外国出版机构抢滩中国，这种变革变得更为激烈，聚珍堂的历史由此展开。作者发现，作为一家北京地区的“传统”出版商，聚珍堂并没有回避新的竞争，而是主动调整经营策略，如降低满语出版的份额，大量发行汉语通俗小说迎合大众阅读需求，引入活字印刷以适应出版数量的需求，使用广告开拓市场。聚珍堂的历史展现了“传统”商业机构的巨大韧性和张力，它们的近代历程不能用“冲击”、“淘汰”来形容，它们和外来的出版机构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大众消费群体，共同营造了一个多元的文化氛围。

同样是研究出版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鲁道夫·瓦格纳的文章着眼于与北京聚珍堂大相径庭的上海《申报》。二者之间的不同一方面体现在经营地域上的差别，前者在首都（传统文化中心地区），后者诞生于近代通商口岸；另一方面，经营者背景迥异，前者是中国本土出版商，后者是英国人创办的新闻业巨头。传统观点认为，《申报》的成功，得益于近代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外国人在华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通过研究《申报》和晚清著名外交官郭嵩焘之间的一段官司，瓦格纳指出外国在华出版机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日本、印度等地颁布新闻出版条例之后，在华的外资报纸也同样面临巨大压力，要考虑清政府的反应，要和政府和读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外交部没有给予《申报》更多的保护。如果《申报》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种种特权，那么它巨大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影响又是从何而来呢？瓦格纳强调《申报》依靠自身巨大的信息量和娱乐性培养了“中国政界、商界和文人阶层对它的文化认同感”，它成功的背后不是中西文化的冲突，而是外来事物与中国市场和读者大众的契合。

在《何处是文化业的中心：从地方艺人到全国明星的晋升看清末北京与上海文化经营模式间的竞争》一文中，叶凯蒂研究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京剧的市场化和明星化过程。京剧被誉为“国粹”，它的早期发展得益于清朝宫廷的襄助，特别是慈禧太后个人对京剧的痴迷使得京剧迅速成为一种主流戏曲艺术形式。在这种以北京和宫廷为主导的视角下，上海和租界对京剧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叶凯蒂的文章强调上海租界的宽松政治环境促使京剧成为大众娱乐形式，不仅如此，在上海的租界里诞生了商业化运作机制，艺人变成了明星和商品，戏班和演出变成了生意和投资。在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下，京剧改变了集体制的戏班，突出了名角的地位，加强了戏院和艺人之间的商业利益合作，这是京剧新的经营模式。同时，包括灯光、布景、化妆、摄影、印刷在内的新技术也改变了京剧舞台艺术形式，京剧变得更具观赏性，成为民间追星的基础。海报、戏单、小报、图画等通俗出版物关注京剧名角的舞台表演和私人生活，将他们变成家喻户晓的演艺明星。上海的租借孕育和实施了这一系列商业化战略，在文化领域内，上海成为北京强有力的竞争者。

瓦格纳和叶凯蒂的文章引出了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即通商口岸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传统的费正清史学认为通商口岸代表先进的西方模式，是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动力，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积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和“中国中心观”的兴起，通商口岸的历史重要性明显地减弱了。它被视为脱离中国内陆乡村、脱离中国大众、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飞地”。因此，它对中国广大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消极的。瓦格纳和叶凯蒂的文章并不是简单的翻案文章，他们的研究为重新全面评价通商口岸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关系和近代化转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专辑收录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尝试重新了解19世纪中国的历史，我们尚不能确定新的研究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体系、框架、假设、观点都会被重新审视。人们熟知的历史叙事方法，例如革命战胜保守、现代取代传统、

西方改变中国等，已经不再能够解读 19 世纪的历史。新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了对立事物之间的模糊界线和复杂关系，在表述方法上，我们更多地使用了另一套动词，诸如“顺应”（accommodate）、“改用”（appropriate）、“再创造”（re-invent）、“重述”（re-interpret）甚至“操纵”（manipulate）。其中包含的各种模糊的含义和矛盾的关系，预示了复杂的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构建了一个庞杂的 19 世纪。

作者马钊，弗多尼亚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